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1.003

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启示

龙潇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其成功传播与毛泽东思想的独特魅力、日本左翼人士积极参与等密切相关。同时,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也面临官方色彩较浓厚、传播渠道有局限性、传播内容单一等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对外政治文化传播要树立正确的传播理念,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创新传播方式,发挥海外人士和海外机构的译介作用,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针对性。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日本;传播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019-0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对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凝练表达,包括《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较为广泛,“日本是全球译介毛泽东论著最多的国家”^①,据《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一书对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情况的统计,《毛泽东语录》日文版多达14个,《毛泽东选集》日文版多达13个^②。

费正清、罗斯·特里尔、尼克·奈特、李旻泰等国外学者都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原因、文化根源、哲学依据、时代价值等。国内学者不仅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刘振瀛、张清华、赵永茂、尚庆飞等还对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其中尚庆飞从文献学视域探讨日本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问题,认为该系列的出版为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日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依托^③。张清华在《〈毛泽东选集〉海外版本的新发现》中,对毛泽东著作的诸多

海外版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了日译本《毛泽东选集》的翻译风格;曹景文在《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对日传播进行研究。大塚有章、近藤邦康、奥村哲、砂山幸雄等日本学者不仅译介了毛泽东著作,还先后出版了许多毛泽东的研究专著,如竹内实的《毛泽东》、近藤邦康的《毛泽东:实践与思想》、岩间一雄的《毛泽东的光与影》等,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及著作在日传播^④。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毛泽东思想对外传播范围、译介情况,并未深刻剖析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经验教训、当代启示等。可见,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研究中仍面临对影响因素关注较少、对传播阶段总结不足、对经验教训分析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教训,探索政治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对外传播规律,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理论和思想文化的对外文化传播。

收稿日期:2021-09-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21YJC740050)

作者简介:龙潇(1983—),男,湖南株洲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日本社会研究。

①徐庆超:《学术外宣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关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案例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②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③尚庆飞:《文献学视域中的毛泽东研究——从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谈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④赵勇等:《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12期。

一 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影响因素

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文化传播受到文化内容、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传播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可以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为依据,从社会文化、传播内容、受众需要等方面分析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影响因素。

(一) 中日文化交流传统

隋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侣,系统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技术等,日本大化革新就参照了唐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明清时期,中国儒学文化在日本上层社会广泛传播,王阳明心学更是在日本风靡一时。近代以来日本系统学习西方文化,历经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成就,促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激发了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促进了中国政治理论的对日传播^①。显然,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为了解,这降低了毛泽东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难度,也有利于日本读者接受毛泽东著作中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 传播内容及受众需要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政治、军事、文学、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使其为斗争中的人民所亲近”^②。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也给亚非拉解放事业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思想的凝练表达,也是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学者要研究中国问题,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有较强的革命性和政治性,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决策、军事斗争、组织动员等思想,是无产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指导力量,可以给日本工人阶级、底层群众的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指引,

满足日本民众的斗争需要。因此,以民主青年同盟为代表的日本左翼团体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毛泽东文学功底扎实,语言表达能力强,擅长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话语阐述深刻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既有利于开展毛泽东著作译介工作,也有利于日本读者准确理解毛泽东著作的思想内涵。

(三) 译介及传播主体因素

二战以后,日本人民走出狭隘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阴影,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抗运动,他们渴望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取理论指导和经验启示。同时,在遭受二战的摧残后,日本主流价值观遭遇严重挑战,左翼人士对日本的政治制度、价值信仰、历史文化等进行深刻反思,并试图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信仰中汲取营养,这增强了毛泽东思想对战后日本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民间团体、进步人士等以各种方式译介毛泽东著作,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在日本左翼人士和民间团体的推动下,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进入新阶段,毛泽东的军事、政治、文学和哲学思想获得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公布了许多毛泽东的档案资料,为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提供了更多史实材料,拓展了研究视野,如近藤邦康、砂山幸雄等日本学者开始将研究聚焦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作用等方面。

此外,中国政府的大力推介也是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抗战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建设,提出要“帮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③。1952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方面,文化部制定了“开拓市场,有节制发行,巩固与日本进步人士和书商的关系”的政策,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

(四) 政治及国际环境因素

中日文化交流深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20世纪后期,国际形势促使日本积极改善中日关系,

①曹景文:《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②赵永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6页。

随着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加,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日渐增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日本访华团体明显增多,日本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日本形成了“毛泽东热”^①。21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较为密切,中国的发展成就激发了日本对中国政治理论的兴趣,这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如太田胜洪、高桥满、毛里和子、竹内实、井上清等都对毛泽东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 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现状分析

(一)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不同方面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活动离不开特定文化环境,跨文化翻译是特定时代和文化中的翻译,并提出了文化传播的“5W模式”,即内容、译者、媒介、受众和效果五个要素。以安德烈提出的“5W”模型为理论指导,可以从内容、主体、媒介和效果四个方面分析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1.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内容

从传播内容看,《毛泽东选集》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文化政策、党建思想等为重要内容;《毛泽东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文章的重要集合,是《毛泽东选集》的有益补充;《毛泽东语录》记录了毛泽东的观点、言论、警句等;《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军事和哲学思想的文学化呈现。《毛泽东选集》等毛泽东著作在日本均有所传播,但是各类著作对日本知识分子或民众的影响力并不相同。日本民众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观念、哲学思想、斗争方式等更感兴趣。《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形式,在日传播最为广泛,如《矛盾论》《实践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日本传播相当广泛,许多日本学者或民众都能阐述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军事方法等。

日本学术界除译介毛泽东著作之外,还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哲学思想、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发展模式等展开研究。如大滨浩、加地伸行、尾崎庄太郎等认为,毛泽东哲学著作提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思想学说,解释了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久住忠男等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继承西方战争观,还传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并创造了游击战理论、运动战思想、军队建设理论等^②。

进入21世纪,毛泽东著作的研究在日本依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中国去向何方:毛泽东初期词文集》;同年,芙蓉书房出版了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专著《战略论大系》;2014年中央公论新社出版了研究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论》等,这些著作主要从学术研究视角审视毛泽东军事、哲学和战略思想,政治色彩较淡,内容更加客观、理性和中立。2003年,近藤邦康在《毛泽东:实践与思想》中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社会主义探索等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从实践论视角总结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深化了日本学术界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和认识。

2.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主体

从传播主体看,不仅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国际书店等是毛泽东著作对日译介的重要主体,而且日本专家学者、民间机构等也是重要传播主体。

其一,中国官方机构是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重要主体。即使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日本官方或主流学术界在美国压力下对中国持全面封锁态度,阻碍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中国政府仍然重视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甚至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著作译介机构。

其二,日本专家学者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竹内实为首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问题专家为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竹内实是日本学术界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人物,他编写了《毛泽东集》及其补

^①日本社民党、日本共产党等派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日本苍苍出版社、三一书房、东方书店、新日本出版社等大量翻译毛泽东文稿和著作;日本国内出现了毛泽东学习会、毛泽东研究会、毛泽东座谈会等学术机构;日本东亚研究所、日本学艺恳谈会等民间组织也大力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②曹景文:《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卷,成为最具权威的毛泽东著作研究文献之一;鹿地亘对毛泽东的许多作品进行译介,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日本的启示,积极投身毛泽东思想对日传播工作,促进了日本社会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还有一些懂汉语的日本知识分子,通过阅读中国报纸、图书等方式对毛泽东思想有初步了解,然后以文章、著作等方式传播毛泽东思想,如中岛岭雄、大塚有章等。2020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导编撰的研究报告论文集《毛泽东研究——人文科学的视角》成为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嚆矢,甫一公开刊印,即被各高校、研究机构收藏。其中,水羽信男详细分析了1935年至1937年之间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江田宪治则以“五四”纪念话语与国共关系为线索探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

其三,中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等在毛泽东著作的对日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萍于2008年6月在日本出版《早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一书,详细地梳理了早期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对毛泽东研究中略显薄弱的早期教育思想进行了有效的补充。此外,国内如火如荼的毛泽东研究也为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文献。除外文出版社、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传统注重外宣的机构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设置的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专栏也为日本学者所青睐,如森川裕贯在比较《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不同版本时就引用了《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刊登的陈标《〈毛泽东思想万岁〉重要版本评介(七)》一文阐述的观点^①。

其四,民间组织是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重要力量。日本左翼团体,如日本共产党、东亚研究所、日华学艺恳谈会、中国研究所等,对毛泽东思想一直保持关注,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高度肯定。尤其是中国研究所,与北京图书馆、中央党校等多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工作。

3. 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是影响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重要

因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等是思想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直到20世纪后期,电视、互联网等才广泛普及。毛泽东著作多以译本、文章、讲座等方式在日传播,其中图书是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主要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采取对华遏制政策,日本完全依附于美国,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国际书店与日本的科学书店、丸善书店、山本书店等进行合作,在日本出售毛泽东著作的日译本,如《毛泽东选集》日译本、《毛泽东文集》日译本等。此外,学习讲座也是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阅读对象多为“左派和进步群众”“汉语学习者”“革命左派”“进步群众”等。许多读者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有限,制约了读者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度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会、讲座等成为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重要方式,如平野义太郎、岩村三千夫、浅川谦次等学者长期开展《毛泽东选集》的专题讲座,他们将毛泽东思想与日本国情相结合,采用“演讲+文字”的方式,增强了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效果^②。

4. 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效果

思想传播是无国界的,只有在交流和碰撞中,才能彰显思想的价值,推动思想的发展。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左翼组织、思想界、文化界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毛泽东著作对日翻译出版看,有尾崎庄太郎翻译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船形书院翻译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外务省调查局编译的《毛泽东主要言论集》等。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日本各界共翻译毛泽东著作多达200余种,其中,1949至1959年是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最密集的阶段。三一书房、东方书店、新日本出版社等在毛泽东著作翻译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毛泽东著作译本选材看,有《新民主主义论》等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也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分析政党建设的,还有《论新阶段》等讨论统一战线的。改革

^①森川裕贯:《毛泽东与胡适》,载《毛泽东研究——人文科学的视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20年版,第1—30页。

^②苏容:《毛泽东论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启示》,重庆交通大学,2016年。

开放以来,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更为深刻和广泛,日本学者出版了大量毛泽东研究专著,如岩间一雄的《毛泽东的光与影》、小田实的《毛泽东》、中屋敷宏的《早期毛泽东研究》、天儿慧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等。这些著作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特征等,分析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著作对日本的思想影响看,毛泽东著作对日本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影响较为深刻,左翼人士将毛泽东著作视为必读经典文献,并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农村包围城市等理论创造性地用于日本社会实践,推动了毛泽东思想日本化。许多日本左翼人士不满足于肤浅的阅读,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哲学、文学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了许多毛泽东研究的理论专著。同时,许多日本进步人士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推动相关图书出版和销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①。

毛泽东著作对日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还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等多个领域。从毛泽东著作对日本社会影响看,由于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反侵略、反军国主义特征,它的广泛传播,给军国主义势力形成巨大冲击,也给日本人民反抗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导。如毛泽东的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思想鼓舞了日本人民反抗军国主义的士气。由亚马逊日本、BOOKLOG等图书网站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20部毛泽东著作日译本的评论总数超过1.5万条,高频词为共产主义、矛盾、革命、理想等,日本读者对毛泽东著作的评价以中立或正面的居多,充分说明毛泽东著作在新一代日本人中仍有较大影响力。

(二)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历史性,受到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

1.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萌芽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就宣传了毛

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土地革命、毛泽东等有所了解。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日本新闻机构就开始报道毛泽东领导红军斗争的新闻,介绍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动向。日本记者、主要媒体等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进行了许多报道,如《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新关系》《中国共产党文献考》等介绍了毛泽东及其思想^②。在毛泽东著作研究中,日本情报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对毛泽东进行了大量调查,还在日文期刊上刊登了许多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持仇视态度,严禁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这一时期对毛泽东著作的译介多以新闻报道、军事情报为主,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③。

2.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发展期

战后日本人民走出狭隘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阴影,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抗运动,他们渴望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取理论指导和经验启示。日本民间团体、进步人士等以各种方式译介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多以介绍毛泽东著作、评析毛泽东思想为主。尾崎庄太郎的《实践论》、鹿地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是其中的代表。野原四郎等日本学者有针对性地研究、翻译和传播毛泽东著作,并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会”。岩村三千夫出版了学术专著《毛泽东的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属性、方法思路等,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④。

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影响力,也给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下的日本人民带来巨大鼓舞。为了从中国革命中汲取经验,鹿地亘、竹内实、野坂参三等向日本政府争取翻译中国文献,对毛泽东著作进行了大量翻译。在这一时期日本民众对毛泽东思想充满热情,为了满足日本读者的阅读需要,《矛盾论》《实践论》

①赵永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②何明星:《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南风窗》2009年第2期。

③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等纷纷以单行本在日发行^①。1967年大塚有章、井上清、中岛健藏等成立“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以学校的方式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定期在日本开展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资料进行编辑出版,如矢吹晋的《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日本国际所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新岛淳良的《毛泽东最高指示》等,介绍了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②。中日建交后,日本各界拥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和了解毛泽东思想,日本知识界对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故居等进行访问,系统收集毛泽东著作的有关资料,整理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毛泽东传记、思想史等,推动毛泽东著作在日的深入传播。许多日本学者从方法论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著作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用于社会实践、科研工作等,将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提升至新阶段。

3. 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成熟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等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以革命斗争、军事战略等为主的毛泽东著作在日本传播逐渐下降,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进入成熟期。20世纪末至今,日本学者对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生平等仍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如野村浩一的《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松本一男的《毛泽东评传》、竹内实的《毛泽东传记三种》等,这些专著的研究视角没有局限于毛泽东思想,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毛泽东成长经历等方面研究了毛泽东^③。这一时期近藤邦康、砂山幸雄、太田胜洪等学者多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出发点,对毛泽东著作、思想等进行研究。此外,太田胜洪、高桥满等学者对毛泽东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汇编,将毛泽东著作编入《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著名学者竹内实多次到毛泽东故居、中央党校等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搜集和整理的相关资料编撰《毛泽东集补卷》^④。近年来日本学者多以比较法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等,如丸川哲

史在著作《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中,对毛泽东和鲁迅的革命思想、革命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松本一男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格、工作方式等进行了对比研究;柳田谦十郎对毛泽东与列宁、马克思等进行对比分析,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局限性^⑤。

三 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对新时代政治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是中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其经验教训对中国文化外宣有重要启示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诸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责任将成功经验、思想理论分享给世界人民,使世界各国能从中国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趋于成熟,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思想理论、政治文化对外传播工作,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消极看法,提升中国话语权,打造中国软实力^⑥。所以应总结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的经验教训,不断创新我国对外文化传播模式,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性、有效性等。

(一) 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成功经验

首先,高度重视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工作,把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作为公共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国家重视发挥编译局、国际书店等在对日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成立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小组,制定针对性的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策略。在对日文化传播中,要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普通日本民众区别开来,针对性地开展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工作。

其次,充分发挥日本友人、左翼人士等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中的积极作用。米泽秀夫、野坂参三、鹿地亘等日本学者积极参与毛泽东著作译介工作,开展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促进了毛泽东

①赵永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②乔君:《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研究》2014年第2期。

③这些著作多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集《日本学者事业中的毛泽东思想》。

④梁怡,李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⑤曹景文:《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⑥汪信砚:《中国文化走出去:意涵、目的和路径》,《江淮论坛》2020年第3期。

著作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同时,日本共产党、东亚研究所、日华学艺恳谈会等,与中国官方机构进行合作,积极推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工作,为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做出较大贡献。

再次,对外文化传播中选择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理论。毛泽东著作之所以在日本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更与毛泽东著作的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选择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有说服力的思想理论^①。

最后,毛泽东著作在日广泛传播,与日本的社会环境和民众斗争需要密切相关。毛泽东思想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决策、军事斗争、组织动员等思想,为日本工人阶级、底层群众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说明,思想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不仅仅与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等有关,还与理论能否满足受众的思想文化需要、社会实践需要等密切相关,只有大力译介海外受众需要的思想文化,才能提高政治理论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的不足之处

首先,对日传播的官方色彩比较浓厚。中国多将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作为对外政治文化宣传的重要内容,通过外宣机构、编译局、国际书店等官方性质机构进行对日传播工作。这种对日传播方式很容易使日本政府产生警惕心理,也制约了民间组织的有效参与。比如在中日关系紧张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多将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视为意识形态渗透,禁止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其次,在日传播的渠道具有局限性。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持否定观点,对毛泽东思想输入较为排斥,想方设法阻挠毛泽东思想对日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多以左翼人士、知识分子等为主要对象。中岛岭雄、大塚有章等左翼知识分子是译介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力量,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往往局限于少数期刊或出版社,这些大大制约了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范围。

所以毛泽东著作在日影响始终局限于少数群体,无法获得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同。

最后,在日传播内容和范围不深入。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中,日本民众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希望以此指导日本国内的阶级斗争。对毛泽东著作的经济思想、文学思想等关注不够,不能结合日本国情针对性地研究或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些影响了毛泽东著作在日的传播范围。同时,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有鲜明的功利性和阶段性,当日本民众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国内斗争时,就接受和学习毛泽东著作;在日本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后,毛泽东著作在日影响力便有所下降^②。

(三)对新时代对外文化传播的启示

1. 创新对外文化传播理念,制定科学的文化外交政策

首先,树立政治中立的对外文化传播理念。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对政治理论、思想文化传播有较大影响,在中美关系紧张、社资阵营分明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是非常艰难的,要遭受多种政治压力和社会阻力。所以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当充分考虑国际政治环境、国家意识形态竞争等因素,化解国际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利影响。比如可以淡化理论文化传播的政治色彩,以客观中立的政治立场开展对外文化传播,减少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不利因素^③。

其次,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活动,优化对外文化传播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④。对外文化传播是提供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只有将文化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才能打造“中国好形象”和“中国好品牌”。所以应当将对外思想文化传播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实施积极稳妥的公共文化外交政策。此外,还应当因地制宜地开展公共文化外交工作。比如中日两国在隋唐时期就有紧密的文化交往,并一直延绵至今,这些为毛泽东

①王振民:《西方人本主义解读〈矛盾论〉的两大范式》,《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苏容:《毛泽东论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启示》,重庆交通大学,2016年。

③刘林涛:《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探究》,《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

④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年第12期。

著作对日传播提供良好文化环境。所以,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当推动文化外交活动,传播仁者爱人、天人合一、中庸和谐、天下大同等中华文化,不断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动思想文化对外传播。

2. 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优化对外文化传播内容

中国政治理论在海外传播时,遭遇各种抨击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时,难免遭遇扭曲和排挤。尽管如此,在思想文化对外传播中也应当坚持“四个自信”,不能为了迎合海外读者、国外受众等放弃中国的核心价值原则和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更不能无原则地迎合西方普世价值理念。比如在思想文化对外传播时,应当保持包容、自信的文化心态,以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态度对待本国的思想理论,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还应充分考虑传播目的国的基本国情、政治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文化需要等,对中国特色思想理论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以日本化、美国化、欧洲化等方式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消解海外读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陌生感、排斥感。

此外,要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内容。毛泽东著作在日广泛传播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合理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取得巨大的革命胜利与建设成就;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满足了日本读者和民众的需要,为日本国内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首先要提高思想理论的系统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受过实践检验的思想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应当充分学习和借鉴美欧等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成功经验,不断推动我国的政治理论创新和思想文化建设,建构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新理论体系。应当建构普适性的对外文化传播话语体系,提高文化输入国对中国思想理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3. 推动政治理论译介工作,发挥海外机构和人士的译介作用

在毛泽东著作对日传播过程中,不仅编译局、国际书店等中方组织承担了许多译介工作,日本

左翼人士、学术团体、知识分子等也发挥重要的译介作用。所以在思想文化对外传播中,要发挥海外机构、海外翻译家、海外知识分子等在中国政论类著作译介工作中的作用。比如可以为海外译者或出版社提供赞助,为中国政治理论的海外译者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支持海外译者在中国政论性著作译介中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使中国政论性著作更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化背景、心理需要等。实践表明,以政府为中心的文化“走出去”,很容易让海外受众产生意识形态输出的价值判断,并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和排斥情绪。同时,官方文化输出往往带有鲜明的脸谱化、模板化等特征,无法与海外受众产生情感共鸣。毛泽东著作的在日传播,多依靠日本左翼人士、知识分子、民间出版机构等,这充分说明民间文化交流是推动政论性著作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所以,在邓小平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对外传播时,应当树立政府“搭台”、公众“唱戏”的文化输出理念,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国际友人的积极作用,为译介中国政论性著作的海外出版社、翻译家等提供经费支持。

4. 从受众的文化背景出发,开展针对性的对外文化传播

对外文化传播是一项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文化活动,对传播方式、译介策略、内容选择等都有很高要求。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成效,与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价值信仰、历史传统等密切相关。中日两国都属于儒家文化体系,日本民众对中国儒学、佛学、军事等都比较熟悉,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接受毛泽东思想。但是欧美、中东、非洲等地区与中国在文明体系、宗教信仰等方面截然不同,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传播难度往往较大。所以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当充分考虑目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文明、价值信仰等,运用针对性的对外文化传播策略。为了提高思想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可以运用以受众为中心的归化翻译策略,用目的语国家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等传播中国政治理论、思想文化等;以受众的思想困惑和精神需要为导向,开展针对性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提高思

想文化的普适性^①。

此外,不断创新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化产业促进对外文化传播。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可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武术文化、茶文化等,在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逐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对外传播,将儒家文化、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传播出去。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产业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美国电影、日本动漫等都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所以应当积极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方式创新,将思想理论和价值文化融入影视、动漫、文学等作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海外受众自觉向中国文化靠拢,主动接受和学习中国思想文化。还可以实施“互联网+文化传播”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利用短视频、新闻网站、国际文化交流网站等方式介绍中国文化,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网络品牌。发挥国内人士、出国留学学生、网络大 V 等在中国文化“走

出去”中的积极作用。如网红李子柒以短视频的方式传播中国古风美食文化,用“中国风+田园牧歌”的方式吸引许多海外受众^②。

结语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著作是我国对外政治理论译介和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受历史文化渊源、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官方译介等多种因素影响,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等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为新时代中国政治理论和政论性著作的对外传播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应当以系统思维看待新时代思想文化对外传播问题,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充分发挥海外机构和国际友人的译介作用,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政治理论“走出去”。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in Japan

LONG Xi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in Japan is mostly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media, audience need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which were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Its suc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ique charm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Japanese lefti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semin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in Japan also faces with problems, such as heavy official meaning, limite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single dissemination content, which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of foreig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dhere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innovate the mode of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role of overseas institutions and people, and carry out targeted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s works; Japan; dissemination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刘林涛:《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探究》,《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曹冉:《KOL助力传统文化传播——以李子柒视频为例》,《新媒体研究》2019年第16期。